

大專院校學生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研究

劉經偉¹、葉怡伶²

摘要

網路普及雖大幅提升生活便利性，卻也衍生諸多潛在危機，其中尤以數位性別暴力最為嚴峻。校園場域常因親密關係衝突，透過網路發布不當言論或散布私密影像，進而引發各類性別平等事件。然而，我國對於校園中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之相關研究卻付之闕如。有鑑於此，本研究旨在探究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性別親密關係中遭受暴力的經驗，以及他們的因應策略。本研究採問卷調查法，透過多個網路平臺向大專院校學生發放匿名問卷，包括：「數位親密關係暴力量表」、「性別平權意識量表」以及「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量表」，共獲得有效樣本 229 份。研究結果顯示，約有六成（58%）的大專校院學生曾遭受過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主要表現為監視控制，而常見的因應策略包括自我傷害、負向情緒調節和直接攻擊。此外，性別平權意識為調節變項，有助於改善大專校院學生們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應策略。研究亦發現，性別、戀愛次數以及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對直接攻擊和自我傷害策略的預測性最佳。並根據上述研究結果，向相關單位提出建議。

關鍵詞：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因應策略、大專校院學生

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生，第一作者。

²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ylyeh@cc.ncue.edu.tw。

壹、緒論

一、前言

在當代社會，民眾的生活型態與網路密不可分，數位環境除提供便利，也帶來多重風險，包括詐騙、霸凌與日益受到關注的數位性別暴力事件，如南韓 N 號房與名人 Deepfake 換臉事件等。校園中亦常見伴侶因衝突而利用社群留下不當言論、散布私密影像，引發各式性平事件。王珮玲等人（2023）調查顯示，臺灣民眾過去一年遭受數位性別暴力者達 1,929 人（盛行率 60.2%），終生盛行率更高達 70.1%，反映數位暴力已成普遍社會問題，並影響民眾安全感。

在跟蹤騷擾情形中，通訊科技更是核心媒介。內政部統計處（2023）指出，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5 月共受理 2,999 件跟蹤騷擾案件，其中家暴相關有 1,261 件，女性受害者（1,159 人）遠高於男性（102 人）。最常見的跟騷行為為「通訊騷擾」，占 24.28%。校園方面，教育部統計處（2022a, 2022b）亦顯示大專院校在性霸凌與性騷擾事件中占比最高，但統計並未區分行為人與被害人是否具有親密關係，亦缺乏針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特別分類。過往約會暴力研究指出，大專學生超過五成曾歷經約會暴力，且常同時具備受害與施暴角色（李珊等人，2017；沈瓊桃，2013；修慧蘭、孫頌賢，2003）。然而，相關研究多著重一般約會暴力，對於「數位性別暴力與親密關係」的連結仍缺乏實證。

國外研究已明確指出，青少年與大學生族群是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主要風險者。Hinduja 與 Patchin（2021）調查發現，美國約有 28% 國高中生遭受 digital dating abuse，其中男、女受害率分別為 32% 與 24%。Caridade 等人（2019）後設分析指出，數位暴力中最常見的型態為監視與控制（65% - 75%），高於直接攻擊（10.6% - 20.3%）。其他研究亦顯示，大學生有超過六成至少遭遇過一種類型（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nry et al., 2020; Marganski & Melander, 2018; Lara, 2020; Leisring & Giumetti, 2014）。Patel 與 Roesch（2022）分析亦發現，不少人曾在未同意下被分享影像（8.8%）、遭受色情訊息威脅（7.2%），而女性是重要的調節因素。這些研究皆指出，青年因高度倚賴電子通訊而處於高風險之中，使得理解與介入此議題更具必要性。

然而，國內相關研究仍十分有限。僅陳怡青（2024）調查臺灣數位親密關係暴力之盛行率，結果顯示 14.7% 民眾曾遭受此類暴力，其中 18 - 30 歲族群比例達 24.1%。對照國外大量關於監控、追蹤、騷擾與性影像暴力的研究（Henry & Powell, 2018; Kaur et al., 2021; Melander, 2010; Spitzberg et al., 2004; Woodlock, 2016），臺灣在「類型」「因應策略」「親密關係情境」等層面皆存在研究缺口。國內約會暴力相關文獻多集中於受暴婦女，顯示大學生常用策略包括：與對方溝通、壓抑忍耐、尋求朋友協助、回想關係中的美好（沈瓊桃，2013）。相較之下，國外受害者更常採取封鎖、更換帳號等因應（Kaur et al., 2021; Spitzberg et al., 2004），部分研究則從壓力因應角度討論受暴後的心理策略（Weathers et al., 2019; Wick et al., 2020）。

國際培幼會 (Plan International, 2020) 跨國調查 31 國 14,000 名女孩，發現 58% 遭受網路性騷擾，其中使用最頻繁的 15 歲族群受害比例最高；且少數民族與 LGBTIQ+ 族群更容易成為攻擊目標。Hall 等人 (2022) 亦指出，女性較男性更易遭受基於性別的網路虐待，性少數與少數族裔亦屬高風險。女性主義觀點認為這反映網路厭女結構，父權體制使女性更易承受侮辱、監控與性暴力 (游美惠, 2012)。整體而言，數位科技與父權文化相互作用，使數位環境成為親密關係暴力的新場域，呈現監控、操控、威脅、性影像濫用等多重樣態。國內目前僅有初步研究，無論在行為類型、親密關係脈絡或因應策略方面皆有待深入。考量「女性主義」在大學生群體中可能引發誤解或刻板反應，本研究採用「性別平權意識」作為概念基礎，以協助個體從性別角度覺察社會文化脈絡，並理解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生成機制。故本研究試圖了解大學生在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和因應策略之間的關係。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包括：

(一) 進行大專院校學生對於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的現況分析。

(二) 了解大專院校學生採取哪些因應策略來應對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三) 了解大專院校學生遭受的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和次數，以及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間的相關性。

(四) 大專院校學生遭受的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和次數、性別平權意識會如何影響其採取的因應策略

以下就本研究重要名詞加以解釋：

(一)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本研究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界定為：行為人基於追求或維繫親密關係之目的，於關係進行中或結束後，持續透過網路與數位科技侵犯伴侶或前伴侶之身體、性徵性或私領域界線。本研究操作型定義依 Borrajo 等人 (2015) 提出之「控制」與「直接攻擊」兩構面，並整合 Spitzberg 與 Hoobler (2002) 之強迫親密關係騷擾 (obsessive relational intrusion, ORI) 概念，增列「騷擾」構面，形成三類行為指標：騷擾、監控控制與直接攻擊，以更精確呈現數位科技介入下的關係侵犯樣態。

(二) 性別平權意識

本研究所稱性別平權意識，指個體在社會文化脈絡中對性別角色、權力分配與不平等結構的辨識能力，並包含促進平權的態度與行動意願。操作上，本研究援用韓國女性發展組織所研發的性別平權量表架構 (Development of a Revised Korean Gender Egalitarianism Scale)，擷取並修訂五項因素，以符合台灣文化脈絡與大學生親密關係經驗。修訂後的測量包含：女性權力需求、男性與女性性別角色規範、父權體制下的親密關係態度，以及親密關係中的性別平權態度。並參酌女性主義發展認同量表 (Bargad & Hyde, 1991)、翁楊絲茜 (2013) 的大專生性別平等意識發展量表及秦穗玟與黃馨慧 (2011) 所改編之性別角色態度量表，以確保工具的文化適切性與內容效度。

（三）因應策略

本研究所稱因應策略，指受害者為減少威脅、維護自身福祉而採取之行動方式。因目前缺乏針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標準化工具，本研究採用沈瓊桃（2011）大專青年約會暴力因應策略量表為基礎，保留情緒策略、尋求協助策略及促進安全策略，並參考 Wick 等人基於 Carver（1997）Short COPE 之網路性騷擾因應分類，以及 Nicastro 等人之跟蹤因應行為，修訂形成五類構面。其中特別將「情緒策略」明確界定為負向情緒調解策略，即避免或降低內部痛苦之方式，但可能導致傷害，包括：自責、壓抑情緒、隱忍與自我傷害策略。其餘構面包括：反抗策略（直接指正或反擊行為人）、尋求協助策略（向親友或正式機構求助）、迴避策略（封鎖帳號、關閉或更換通訊工具）、促進安全策略（提升資訊安全設定與保護措施）。上述構面共同構成本研究之因應策略量表架構。

二、文獻回顧

（一）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1.何謂數位性別／性違法侵害行為（digital gender-sexual violations, DGSV）

根據行政院在 2021 年 2 月頒布的「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數位性別暴力被定義為「透過網路或數位方式，基於性別的暴力行為。即針對性別而施加於他人的暴力行為或不成比例地影響他人，包括身體、心理或性方面的傷害、痛苦、威脅、壓制和剝奪行動自由等。」（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1）。在學術研究領域，數位性別／性暴力已引起學者們的廣泛關注與討論，但至今數位性別暴力的定義仍不明確，存在許多待釐清的面向（王珮玲等人，2023；Hall et al., 2022; Henry et al., 2020; Maddocks, 2018）。

Sophie Maddocks（2018）調查了 12 個國家的專家對復仇式色情（revenge porn）的定義，並透過澳洲、拉丁美洲、英國、美國與歐盟等地，提出六種替代詞彙，分別為未經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NCP）、影像性暴力（image-based sexual abuse, 簡稱 IBSA）、科技促成的性暴力（Technology 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簡稱 TFSV）、未經同意傳播、控制、操弄與暴露親密訊息（non-consensual dissemination of intimate information,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exposure of intimacy）、數位強暴、偷拍與數位偷窺（digital rapist, creepshotter and digital voyeur）等。同樣地，研究指出至少有 18 至 30 種不同名詞指稱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例如：Cyber Dating Abuse, Electronic Dating Aggression, Online Teen Dating Violence（Caridade et al., 2019; Fernet et al., 2019）。由於沒有共同的專業名詞界定形成共同解釋框架，難以發展出有效的應對策略。

過去的文獻主要使用影像性暴力，這包括各種影音和圖片的創作與散布，和科技促成的性暴力是最廣泛使用的術語。這兩個名詞都隱含這些行為的本質是性犯罪（Henry & Powell, 2018; Henry et al., 2020; Maddocks, 2018; Patel & Roesch, 2022）。Hall 等人（2022）認為，在界定數位性別／性暴力時，若著重

於科技變革的名詞（例如科技促成的性暴力），會掩蓋這些行為的社會脈絡；若著重於行為的特殊形式，則忽略人際互動過程，且科技、性與性別的明確性會被省略。女性主義學者質疑這些概念在虛擬網路上更為複雜與模糊，實際上三者之間的交織才會形成所謂的數位性別／性暴力，並提出數位性別／性違法侵害行為更為適合。

從文獻探討中得知，數位性別／性暴力涵蓋了數位科技、性與性別、違法行為或暴力行為之間的關係，使用性別／性、違法行為等詞彙更為適當，因為數位性別暴力受到各種社會脈絡、環境與科技的影響。因此，本研究認為數位性別／性違法侵害行為是一個更合適的名詞解釋。所謂數位性別／性違法侵害行為是指網路使用者運用數位科技作為媒介，對目標對象進行涉及性別／性的不法勾當，例如：暴力攻擊、散佈未經同意的裸照、騷擾與販賣裸露影音謀取利益等，這些行為可能發生在親密關係、熟人或陌生人之間。

2.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定義與內涵

由於數位通訊科技的發達，例如智慧型手機、約會網站、即時視訊聊天等，使人們在尋求、發展、進入、維繫、結束親密關係的過程中，獲得了全新的體驗。科技帶來了增進親密關係情趣和樂趣的便利與好處，同時也為親密關係中的犯罪者提供了更多策略，對另一方施加暴力。由於數位性別／性暴力在學術界沒有統一的詞彙，目前行政院僅公佈了數位性別暴力的定義，尚未有完整的法律配套措施。而國外文獻顯示數位性別暴力的名詞多元，行為人和受害者之間的關係包括伴侶、前伴侶、熟人或陌生人等不同類型。本研究仍以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一詞來指稱。

本研究透過過往文獻資料，對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進行了定義。數位親密關係暴力主要讓人聯想到對於現任伴侶的數位暴力行為，但從文獻資料與家暴和騷擾案件統計中，前伴侶也是重要的關係人。Spitzberg 等人（2004）認為個人渴望與他人連結是普遍的，期待與他人產生和諧性、合作性、互惠性和相互性，促使人們追求親密關係。然而，渴望與他人聯繫的過程中存在一顆黑暗的心，將親密關係的追求轉化為跟蹤，變成一種強迫性的連結。這主要有兩種形式：強迫性親密關係侵擾（obsessive relational intrusion, ORI），即一種重複和不必要的侵擾行為，對另一方有心理或象徵性的意涵，不論對方是陌生人或熟人，渴望或假想建立親密關係；以及網路過度追求（cyber obsessional pursuit, COP），更極端地將單方面的追求視為一種親密關係。本研究仍以曾經有過交往經驗的雙方為主。

本研究定義的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為：雙方現今或曾經在日常生活中有實際親密關係，即便關係結束，仍對前任伴侶有強迫性親密關係侵擾慾望，並使用數位網路科技，對現任或前任伴侶進行侵入騷擾、監視控制與直接攻擊等行為。本研究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分為侵入騷擾、監視控制與直接攻擊，分述如下（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 Woodlock, 2016）：

（1）侵入騷擾

侵入性騷擾源自強迫性親密關係之侵擾與跟蹤行為（Bélanger et al., 2021;

Cupach & Spitzberg, 2000; Henry et al., 2020; Lyndon et al., 2011; Melander, 201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 Thulin et al., 2022; Woodlock, 2016)。其動機多基於害怕被遺棄或扭曲的移情認知 (Bélanger et al., 2021; Cupach & Spitzberg, 200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此類行為雖非皆具威脅性，但常因雙方界限認知落差，表現為散播流言、性騷擾（如性暗示圖文）、過度關注或頻繁聯繫等不受歡迎之網絡行為，造成受害者心理壓力（陳怡青，2024; Hellevik, 2019）。本研究將侵入性騷擾定義為：伴侶藉數位科技施以強迫性親密行為，含括不當言論與滋擾聯繫，致使受害者困擾之行為模式。

（2）監視控制

「監視」意指秘密觀察以掌握活動，「控制」則為操縱節制。兩者均是伴侶間常見的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形式 (Borrajó et al.,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 Woodlock, 2016)。其特徵係利用通訊科技（如 GPS、社群媒體）侵害隱私並全時掌控行蹤 (Borrajó et al.,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 Woodlock, 2016)。科技打破空間疆界，導致受害者恐懼與孤立 (Woodlock, 2016)。本研究定義「監視控制」為：伴侶藉數位科技暗中監測，操縱受害者數位使用與生活場域，侵害隱私並施加無所不在的掌控壓力。

（3）直接攻擊

直接攻擊為數位親密關係暴力之重要樣態 (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此概念指涉透過數位媒介傳遞具攻擊性之圖文影音，雖非實質肢體暴力，卻對受害者造成羞辱、恐懼等心理創傷，甚至構成強迫控制 (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其形式光譜涵蓋常見的網路咆哮 (flaming) 至較少見的散布私密影像 (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本研究定義直接攻擊為：伴侶藉數位科技發送攻擊性內容，致使受害者心理受創或被迫服從之行為。

（二）性別平權意識

1. 性別平權意識定義與內涵

性別平權意識是指個人在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環境中，對性別角色的持續意識和理解。這種意識形塑了個人對性別認同、社會性別期待，以及性別結構與權力不平等的認識 (翁楊絲茜等人，2013; Gerson & Kathy, 1985; Seemanthini, 2015)。性別平權意識的主要內涵包括對性別結構的不滿意與批判，以及對性別平等的期待，並藉此促進改善性別不平等的行動 (畢恆達，2003; 楊幸真，2019)。因此，性別平權意識不僅涉及個體層次的自我覺醒，也包含對社會層次的性別不平等結構提出反思和行動。因此，本研究者们認為，性別平權意識是指個人受到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環境影響，形塑出對自我性別和社會期待性別的認知、態度與價值觀的敏感性與自我覺醒，能夠辨識性別

結構中的不平等，不僅關注個人，更要求所在的社會環境進行改善。

2. 網路中的性別平權意識：烏托邦與貧民窟的雙重視角

數位網路的主流文化是偏向男性觀點，甚至有些學者認為網路其實屬於男人的地盤，充滿「陽剛文化」，如此出現了全球化科技性別化的不平等現象 (Wajcman, 1991; Haraway, 1997)。學者 Ebo (1998) 就提出網路理想國 (cybertopia perspective) 與網路貧民窟 (cyperghetto perspective) 兩種觀點。然而，羅燦煥 (2003) 針對運用焦點訪談的方式，詢問台灣大學生們網路上性別互動與線下性別實踐之間關係，結果證實網路貧民窟的觀點，網路上性別互動不但複製，而且會強化線下性別文化實踐，網路實際上是現實社會性別不平等的延伸，甚至強化了既有的父權體制和性別階層，形成所謂的「網路貧民窟」 (廖美蓮, 2019; Haraway, 1997; Wajcman, 1991)。Henry 與 Powell (2015) 從女性主義觀點探討數位科技如何再現傳統性別暴力，指出網路空間中的性別暴力受限於線上與線下的二元論，使得人們難以全面理解其複雜性。

3. 數位性別/性親密關係暴力的特性與理論基礎

親密關係暴力的成因涵蓋個人層面與社會文化視角。個人層面主要關注施暴者的個人特質、內在心理狀態或精神疾病，並常以社會心理學理論（如挫折—攻擊理論、暴力循環理論）加以解釋。社會文化視角則包括女性主義、衝突理論與家庭結構因素，強調權力控制與父權體制文化對暴力行為的影響（陳又敬等, 2019）。數位科技的發展進一步影響親密關係的動態，並可能成為親密關係暴力的觸發因素。Clayton、Nagurney 與 Smith (2013) 針對 205 名 18 至 25 歲的 Facebook 用戶進行調查，發現 Facebook 的高頻使用與親密關係中的負面結果（如分手、離婚、情感與身體出軌）之間存在顯著關聯。高度使用 Facebook 可能間接導致伴侶忽視，透過與前任交流增加情感疏離，甚至引發嫉妒與監控行為，進而加劇親密關係中的衝突與不信任。由此可見，親密關係暴力的成因不僅涉及個人心理因素，更與社會文化層面的性別權力結構密切相關。

研究顯示，親密關係暴力的迷思程度與個人的性別平權意識密切相關，特別是在父權體制對暴力的合理化方面（黃楷婷與趙善如, 2015）。數位科技的發展更進一步成為強化父權結構與性別不平等的工具。例如，網路不僅是暴力行為的延伸媒介，也反映並再製了現實社會中的性別文化實踐 (Faith, 2022; Hall et al., 2022)。具體而言，數位性別暴力形式包括性騷擾、監控與散布私密影像等行為，這些行為不僅侵犯受害者隱私，更深化性別仇視與羞辱（邱育佳等, 2020）。

關於數位約會暴力的研究顯示，性別與受害經驗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一些研究認為，男性與女性在受害與加害行為的報告率上相當，然而，女性報告的心理痛苦程度顯著高於男性。30 歲以下的受訪者比 30 歲以上更容易成為受害者，而性少數群體的受害風險亦高於異性戀者 (Henry et al., 2020)。此外，社會對性別的刻板印象也影響個體的行為決策，例如，女性往往被標籤為「蕩婦」，而男性則被認為是「玩家」，這種性別雙重標準使女性承受更大的社會壓力，進而增加其向伴侶發送私密影像的可能性 (Pedersen et al., 2023)。由此

可見，性別仍然是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重要影響因素，並進一步加劇性別權力的不平等。

4. 性別平權意識影響數位性別暴力的解讀與因應

性別平權意識影響受害者對數位性別暴力的感知與反應。羅燦煒（2003）的研究指出，大學生對數位性別暴力的解讀受性別平權意識形態影響，並與父權文化相互作用，影響受害者的因應策略。Shi 與 Zheng（2021）的實驗研究進一步證實，對女性主義的認同能提高對性別暴力的敏感度，並加強對不平等現象的覺察。Brown 等人（2020）研究顯示男性與女性皆可能參與數位親密關係中的監督與控制行為，但表現方式存在顯著差異。女性與男性受訪者皆認為，女性在監督與控制伴侶方面承擔較多責任，並常透過科技以直接或隱晦的方式行使控制權。例如，年輕女性傾向於將某些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行為視為愛的表現，並利用科技作為維繫親密關係的手段。然而，男性受訪者並未主動提及這類行為，顯示出男性對電子監控等非身體形式的關係暴力認識相對不足。在數位性別暴力的具體行為上，男性與女性的行為動機及社會後果亦存在顯著差異。例如，男性可能透過分享女性的私密影像來提高同儕地位，將其作為炫耀或展示「男性氣概」的方式。而在性別雙重標準的影響下，遭受影像散布的女性則往往被污名化，承受更多社會批判。這反映出數位環境中男性氣質的維繫與性別不平等的再製。相較之下，女性雖然也可能參與私密影像的轉傳與分享，但其動機更多偏向於嘲諷或羞辱，而非社交炫耀。例如，部分女性受訪者表示，她們會對收到的男性裸露影像進行截圖，並在群組聊天中展示，作為娛樂或諷刺對象：「這個人給我發了他的屁股照，還有他的陰莖」，隨後群組成員可能僅以嘲笑回應，未進一步擴散影像。這種行為反映了性別規範的影響—女性雖然參與此類行為的比例低於男性，但仍可能透過數位媒介對異性進行某種程度的反擊或反抗。

然而，網路不僅是數位性別暴力的傳播媒介，同時也是抵抗這種暴力行為的工具。過去的證據顯示，數位性別暴力受害者遭到辱罵時，也有人挑戰這種濫權行為，促使女性主義在網路上蓬勃發展（Hall et al., 2022）。Shi 與 Zheng（2021）的實驗研究證實，女性對女性主義的認同程度與對性騷擾的知覺有顯著影響。女性主義認同度高的人對兩種類型的性騷擾（性騷擾與不想要的性關注）具有更敏感的感知，可見女性主義的認同在性騷擾覺知方面具有調節作用。Me Too 運動是一個典型例子，由社會運動者 Tarana Burke 於 2006 年在 Myspace 社群網站首次使用「我也是（Me Too）」，以推廣與實踐「用同理心實現賦權」，特別是針對被性侵犯的有色人種，尤其是底層女性（維基百科，2023）。李昕（2020）的深度訪談發現，網路社群能促使受害者彼此連結，互相賦予力量，勇敢面對並抵抗，不僅使受害者得以自我修復和反思，還能为社會文化中性別不平等和性別教育的重要性發聲和倡議。Fatimatuazzahro 與 Achmad（2022）透過 TikTok 上的 What If It Was You（#WIIWY）數位社會運動，以虛擬民族誌研究的方式，鼓勵對網路數位性別暴力和網路霸凌感興趣的人參與，進一步提高社會對網路欺凌的認識。無論是 Me Too 運動還是 What If

It Was You 數位社會運動，都反映了受害者敢於站出來發聲的願望，使人們更加認識到性別暴力對他人的傷害，從而提升社會對這一議題的關注。因此，受害者積極的應對策略包括參與社會運動，並以個人經歷回應所遭受的傷害，以抗拒加害者。

（三）因應策略

因應策略可以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進行分類。宏觀層面涉及一般應對原則，而微觀層面則涉及具體行動策略。Spitzberg 等人（2004）認為，因應策略本質上是風險管理，包含策略的類型學與因應策略兩個面向。策略類型學指的是針對加害者的行為類型採取相應的應對策略，例如對跟蹤和性騷擾等行為的應對。而因應策略則是指一般應對技巧，如關係管理和重新定義關係等。微觀角度則視壓力因應為一種認知與壓力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個體透過此過程掌握、減少或容忍壓力交易產生的內外部需求，主要分為以問題為導向的因應（problem-focused coping）和以情緒為導向的因應（emotion-focused coping）（Lazarus & Folkman, 1984）。

本研究認為，針對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應策略，受害者可以有效運用不同策略與自我保護行動。過去文獻顯示，個人資源主要在面對壓力事件時發揮作用，這包括自我調適的過程（Weathers et al., 2019; Wick et al., 2020）。尋求協助則是透過正式與非正式資源來應對壓力（沈瓊桃，2013；Carver, 1997; Cupach & Spitzberg, 2000; Nicastro et al., 200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目前，國內外對於數位性別暴力行為的因應策略研究仍然不足，但已有一些研究開始針對數位性別暴力相關主題進行探索，主要透過壓力行為反應、風險管理和調查整理等方法，多數研究集中在跟蹤行為上（Cupach & Spitzberg, 2000; Kaur et al., 2021; Nicastro et al., 200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 Wick et al., 2020），以及個體遭受壓力時的因應行為（Weathers et al., 2019; Wick et al., 2020）。

研究顯示，數位網路親密關係暴力對伴侶或前伴侶造成壓力（Henry & Powell, 2018; Leisring & Giumetti, 2014; Melander, 2010; Weathers et al., 2019; Wick et al., 2020; Woodlock, 2016）。因應這種暴力行為，適應性因應（adaptive coping）和迴避性因應（avoidant coping）是主要的策略，前者包括積極應對、情感支持、工具支持、正向框視、策略因應和接受等方式，後者則包括自我責怪和否認等（Carver, 1997; Weathers et al., 2019; Wick et al., 2020）。實際上，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會頻繁更換電話號碼、關閉社交媒體帳號，甚至在警方建議下換號碼或封鎖加害者（Harris & Vitis, 2020; Woodlock, 2016; Weathers et al., 2019）。

過去研究表明，數位網路上與線下的暴力行為密切相關，兩者常混合出現（Borrajó et al., 2015a; Hellevik, 2019; Hinduja & Patchin, 2021; Marganski & Melander, 2015; Lara, 2020; Lu et al., 2021）。現實生活中遭受親密關係暴力的倖存者可能會察覺到自己被跟蹤與監控，常會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研究顯示，倖存者在尋求資訊安全專業人士協助時，常遇到對他人技術濫用的擔憂，因此

建立對資訊安全專業人士的信任顯得尤為重要（Freed et al., 2017, 2019）。

數位網路親密關係暴力常採用類似於現實跟蹤的行為。Kaur 等人（2021）回顧了過去網路跟蹤行為的常見因應策略，包括避免與忽略、對抗策略和尋求支持策略。Spitzberg 與 Cupach 提出的三種因應策略包括單方面的自我保護（unilateral protection）、攻擊性的自我保護（aggressive protection）以及溝通協調（interaction）（Spitzberg & Cupach,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約 50% 的被跟蹤者會求助於警察，但在司法介入過程中，常面臨法律的限制和困境（Nicastro et al., 2000）。

目前我國對於親密關係的因應策略研究有限。沈瓊桃（2013）採用分層隨機抽樣，通過問卷調查收集了 1,018 位大專青年面對約會暴力最常使用的策略，這些策略包括與對方理論、多想想對方和這段感情的美好之處、尋求朋友的協助和忍耐；最少使用的策略為尋求專業人士的協助、尋求警察與司法的協助、尋求學校教師、輔導老師或教官的協助，以及使用酒精或藥物。由於目前尚無針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應量表，每種親密關係暴力行為採取的方式不同，會影響受暴者的應對方式。然而，面對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主要透過數位網路平台進行的暴力行為，其因應策略可能與過去親密關係暴力的應對策略有相同與不同之處。

（四）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對於因應策略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以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為主題，探討其對大學生因應策略的影響，並假設性別、年齡、戀愛經驗、性別平權意識等因素能有效預測大學生所採取的因應策略。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主要受害者通常為女性與性少數群體（Caridade et al., 2019; Lara, 2020），然而，部分研究顯示數位性別暴力亦可同時發生於男性與女性之間（Henry et al., 2020）。關於年齡方面有研究指出，年齡是影響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重要因素，年輕人比年長者更容易遭受此類暴力。主要原因包括：1. 年輕人長時間使用電子通訊設備，增加暴力發生的機會；2. 情境模式假設，曾經歷虐待的人在親密關係中易重複遭受攻擊性行為；3. 年輕女性因缺乏資源與經驗，未充分認識此類暴力的嚴重性，而年輕男性伴侶可能因嫉妒、溝通不足等控制女性伴侶（陳怡青，2024；Damra et al., 2024; Patel & Roesch, 2022）。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角色通常由前伴侶擔任，特別是在青少年及大學生階段，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率顯著增加（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此外，暴力行為多發生於戀愛關係正在進行或剛結束的時期（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Melander, 2010; Thulin et al., 2022）。由於上述文獻顯示前任伴侶常是行為人，且戀愛正在進行與剛結束時期，又是暴力行為好發時期，故本研究認為隨著戀愛次數增加，伴侶可能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機會增高，故需要採取相對應的因應策略。

面對強迫性親密關係中的侵擾與跟蹤行為，過去研究將大學生因應策略分為四類：交流溝通（interaction）、保護（protection）、報復（retaliation）和

迴避 (evasion) (Spitzberg & Cupach, 2002;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其中，尋求法律途徑的協助亦被視為一種反抗策略 (Spitzberg et al., 2004)。研究顯示，數位性別暴力與因應策略之間具有因果關係，且受害者常出現負向情緒反應，如憂鬱、焦慮，以及高風險行為如酒精濫用或危險性行為 (Caridade et al., 2019; Henry et al., 2020; Thulin et al., 2022)。這些行為的發生也與性別差異密切相關，女性較易出現憂鬱情緒，而男性則更常出現飲酒行為和高風險性行為 (Caridade et al., 2019; Henry et al., 2020; Thulin et al., 2022)。此外，青少年在面對親密關係監控行為時，保護因子包括家長監控及人際支持 (Thulin et al., 2022)。數位空間中的暴力行為與離線世界中的約會暴力有高度相關性 (Borrajó et al.,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沈瓊桃 (2013) 大專青年面對約會暴力最常使用的策略，這些策略也是本研究透過文獻整理，發現因應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與線下約會暴力重疊性高，故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不僅與因應策略有高相關，甚至可能不同的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行為，預測不同的因應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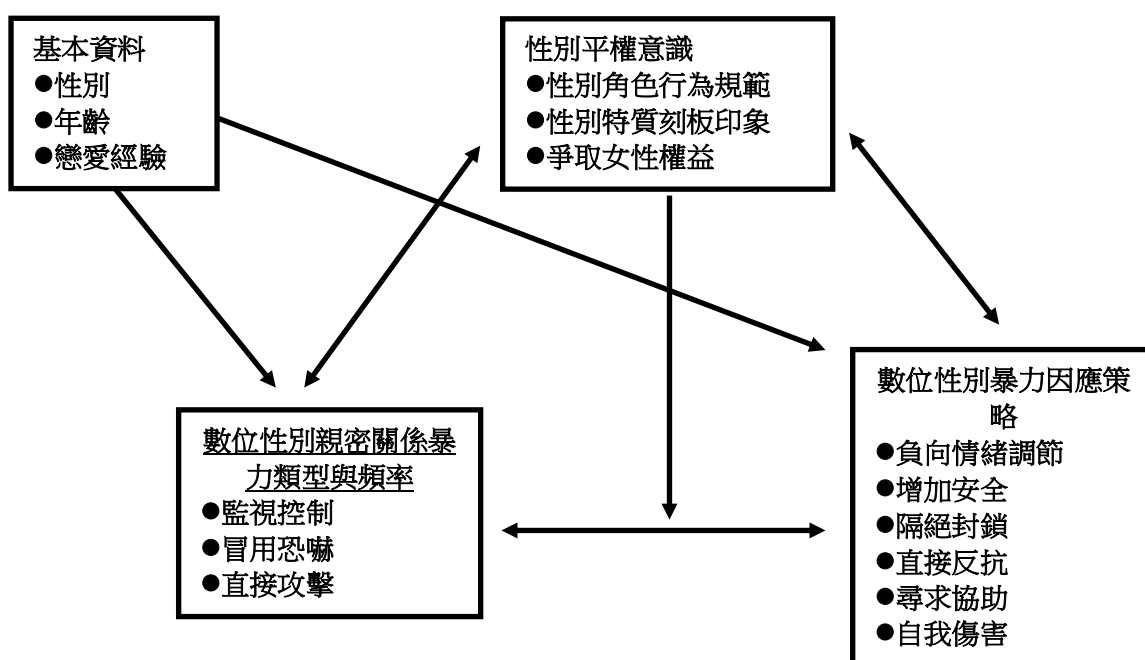
異性戀大學生中，女性主義認同與心理虐待之間呈現高度相關，女性主義認同不僅幫助異性戀女性辨識心理虐待，亦可能減少她們報告遭受心理虐待的情況 (Citarella & Mueller, 2015)。數位性別暴力如同心理暴力，亦受到性別及性別信念影響，女性主義的認同不僅對於性騷擾知覺有顯著影響，同時也更能辨識網路跟蹤行為 (Becker et al., 2021; Shi & Zheng, 2021)。由於性別及性別信念、女性主義的理念，都是朝向不論何種性別都能夠更平權的生活，且研究也顯示強迫性親密關係中的侵擾與跟蹤行為應策略與性別有高度相關，故本研究認為性別平權意識影響遭受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因應策略。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專院校學生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關係，以及探究性別平權意識對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因應策略是否具有調節效果。根據前述研究動機與文獻探討內容，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圖如圖 1 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圖



而基於本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設如下：

（一）假設一：不同年齡、性別大專院校學生之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與因應策略有顯著差異。

（二）假設二：不同戀愛經驗大專院校學生之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與因應策略有顯著差異。

（三）假設三：大專院校學生之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與其因應策略有顯著相關。

（四）假設四：大專院校學生之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有顯著相關

（五）假設五：大專院校學生之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與性別平權意識有顯著相關。

（六）假設六：大專院校學生之性別平權意識對於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與因應策略有顯著調節效果。

（七）假設七：大專院校學生之性別、年齡、戀愛經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類型、頻率、性別平權意識與性別平權意識對於因應策略有預測作用。

二、研究實施程序

本研究以大專院校在校生為研究母群體，採取非隨機便利抽樣，以目前在學之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對象。本研究在正式施測前，為確認問卷內容是否有文字模糊或難以理解之處、檢驗編修後之量表信效度，需進行預試。預試以立意抽樣之方式，在中部某大學透過網路平台（Facebook 學校社團、Dcard 校版）邀集 103 位在學生進行網路問卷之填答，根據參與預試者的反應與建議，修正題目敘述以形成正式問卷，並進行問卷之信效度分析。

正式問卷採取網路調查方式進行，以便利抽樣為抽樣方法，使用 google 表單進行問卷調查。為試圖觸及臺灣各地區之大專院校在校生，以目前常使用之不同網路平台（包括：Facebook、Line、Dcard 等），以及邀請親朋好友協助將問卷填答邀請張貼於大專院校學生常用的網站、網頁，邀請參與者填寫問卷，並以確實填答完畢後可進行抽獎，鼓勵填答，問卷調查期間為 112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22 日止。

三、研究對象與樣本分析

正式研究涵蓋了 403 位大專院校在校生的參與，經過無效樣本的剔除，最終得到有遭受數位性／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 229 位。研究對象的年齡分佈平均為 24.05 歲，最年輕者為 18 歲，最年長者為 48 歲，標準差為 5.82。在學生類別方面，有 156 位大學生、69 位研究生以及 4 位博士生參與。就戀愛經驗而言，戀愛次數 1 次有 52 位、戀愛次數 2 次有 63 位、戀愛次數 3 次有 51 位、戀愛次數 4 次以上有 63 位，整理如下表 1。

表 1

有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背景資料統計表（n=229）

變項	類別	人數（人）	百分比(%)
性別	男	58	25.3%
	女	169	73.8%
	多元性別	2	0.9%
年齡	18-20 歲	65 人	28.4%
	21-24 歲	78 人	34.1%
	25-27 歲	37 人	16.2%
	28 歲以上	49 人	21.4%
教育程度	大學生	156	68.1%
	研究生	69	30.1%
	博士生	4	1.7%
戀愛次數	戀愛次數 1 次	52	22.7%
	戀愛次數 2 次	63	27.5%
	戀愛次數 3 次	51	22.3%

四、測量工具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以自陳式量表作為研究工具，包含數位親密關係暴力量表、性別平權意識量表與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量表，以下將分述各量表內容與信效度。

（一）數位親密關係暴力量表

本研究以 Borrajo 等人（2015b）發展之網路約會暴力問卷（cyber dating abuse questionnaire, CDAQ）以及 Spitzberg 與 Hoobler（2002）之強迫性親密關係侵擾內涵為基礎，強迫性親密關係侵擾量表也被運用在調查前伴侶運用網路的跟蹤騷擾行為（Lyndon et al, 2011; Spitzberg & Cupach, 2014; Spitzberg & Hoobler, 2002），發展出本研究之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量表。量表信度方面，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95，顯示信度良好；效度部分，量表之 KMO 值為.91， $p=.00<.05$ 達顯著，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考量原量表三因素結構，以強制三因素進行探索式因素分析，結果顯示不需刪除題目，各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介於.54 到.84 之間，故保留所有題目，量表可解釋之總變異量為 64.14%。監視控制、冒用恐嚇與直接攻擊三個分量表之 α 值分別為.92、.92、.91，顯示各分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本量表共 28 題，以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計分，1 為「從未發生」、2 為「發生 1-3 次」、3 為「發生 4-6 次」、4 為「經常（7-9 次）」、5 為「發生 10 次以上」，各分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個人經歷所代表之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行為頻率越高。

（二）性別平權意識量表

本研究依據 Lee、Kim 和 Ko（2019）於韓國女性政策研究院（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編修之性別平權量表（Korean gender egalitarianism scale）、翁楊絲茜等人（2013）參考秦穗玟與黃馨慧 2011 年之性別角色態度量表改編大專生性別平等意識發展量表等兩個量表之內容，進行本研究的量表編修。由於本研究對象為臺灣之大專院校學生，因此將前述兩量表中與家庭相關的性別平權意識題項，在考量臺灣文化特性以及大學生親密關係交往情境之下，將量表題目修正為符合本研究對象填答之題目。在信度方面，總量表 Cronbach's α 值為 0.90，顯示信度良好；效度部分，KMO 值為 0.91， $p<0.05$ ，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探索式因素分析結果得出四因素，可解釋總變異量 60.03%。因素結構中有兩題表現不佳，無論是運用原本性別平權意識的架構或探索式因素分析，驗證式因素分析模式適配度極差。透過逐步刪除與反覆驗證，考量樣本性別結構偏誤與題目後，最終認為刪除因素四後的三因素模式最為適合，指標為 $\chi^2/df=487.9/132$ ，CFI=0.89，AGFI=0.84，NFI=0.89，INFI=0.90，RMR=0.121，RMSEA=0.08，根據 Ullman（2001）指出，由於 NFI 在樣本數小的時候會被低估，因此建議在小樣本的情形下，可放寬到 0.8 的標準；此外，GFI、AGFI 值亦高於可接受標準值.80(Bagozzi & Yi, 1988；Jöreskog, 1970)。顯示本量表適配度尚佳。最終量表歸納為「性別角色行為規範」、「性別特質刻

板印象」、「爭取女性權益」三項因素。信度方面，最終總量表的 Cronbach's α 係數為 0.91，而三個分量表的信度與因子合載 CR 與 AVE 分別為性別角色行為規範 Cronbach's $\alpha=0.88$ 、CR=0.88、AVE=0.47；性別特質刻板印象 Cronbach's $\alpha=0.84$ ，CR=0.85、AVE=0.53；爭取女性權益 Cronbach's $\alpha=0.69$ 、CR=0.83、AVE=0.55。本量表共 18 題，第 10 題為反向計分，以李克特氏六點量表計分，1 為「非常同意」、2 為「同意」、3 為「有點同意」、4 為「有點不同意」、5 為「不同意」、6 為「非常不同意」，各分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該分量表之性別平權意識越高。

（三）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量表

由於國內外文獻目前尚未有針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之測量工具，因此本研究參考沈瓊桃（2011）之約會暴力因應策略量表、Wick 等人（2020）改編 Carver 於 1997 年發展之短版因應策略量表（the short COPE）、Nicastro 等人（2000）對於受害者面對跟蹤的行為反應描述、Spitzberg 與 Hoobler（2002）針對網路過度追求提出的因應策略等相關文獻，編製成測量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之量表。

量表信度方面，總量表之 Cronbach's α 值為.86，顯示信度良好；效度部分，KMO 值為.84， $p=.00<.05$ 達顯著，顯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本研究以探索式因素分析後顯示，不需刪除題目，區分出負向情緒調節、增加安全、隔絕封鎖、直接攻擊、尋求協助與自我傷害等六個因素，各分量表之因素負荷量介於.52 到.87，量表信度介於.68 至.78，故保留所有題目，量表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66.49%。本量表共 20 題，以李克特氏五點量表計分，1 為「從未」、2 為「很少（1-3 次）」、3 為「偶爾（4-6 次）」、4 為「經常（7-9 次）」、5 為「總是（10 次以上）」，各分量表的分數愈高，表示個人愈傾向使用該分量表所代表之因應策略類型。

五、資料處理與分析

本研究以運用 SPSS23.0 統計分析軟體進行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 t 檢定、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 相關分析、簡單線性迴歸與多元迴歸進行資料分析。

參、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檢驗本研究七項假設，資料分析以 SPSS 進行，並依變項特性採用適切統計方法。首先，針對性別與年齡差異（假設一），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與單因子 ANOVA，必要時進行 Scheffé 事後比較；戀愛經驗差異（假設二）則以 MANOVA 檢視多項依變項之組間差異。為檢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與性別平權意識間之相關（假設三至五），採皮爾森積差相關與線性迴歸分析，評估其相關與預測力。此外，為驗證性別平權意識的調節角色（假設六），採階層多元迴歸，依序投入控制變項、自變項、調節變項及交互作用項，並於達顯著時繪製調節效果圖。最後，檢驗人口變項、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與性別平權意識對各類因應策略的預測效果（假設七），以多元迴歸進行分析，評估各變項對負向情緒調節、隔絕封鎖、直接攻擊等策略的解釋力。

一、研究結果

（一）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現況分析

1. 遭受過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的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行為之現況

在所有 395 位研究對象當中，完全沒有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為 166 人（42%），有遭受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者（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量表至少得 1 分者）為 229 人（58%），有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年齡介於 18 到 48 歲之間。在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三個分量表、總量表與性別、學制、感情狀態進行交叉敘述性統計結果，題項的中位數（介於 1 至 2.11 之間）與眾數（介於 1 至 2.11 之間）皆低於平均數（ M ）（平均數介於 1.12 至 2.19 之間），詳細內容請參閱表 1，發現不論性別、學制、感情狀態大多數人填答狀況都低於 M ，填答落於「從未發生」至「發生 1-3 次」，故大多數人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狀況頻率較低，如下表 2。各題目填答狀況，僅只有「23.我的現任或前任伴侶，傳送讓我感到壓力的訊息（例如：施加壓力要我同意某事、前任要求復合、要求你要再給他機會）」此題中位數（2）高於 M （1.91），其他題目中位數與眾數，皆低於 M 。

2. 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的性別平權意識之現況分析

女性在總體性別平權意識、性別角色規範與爭取女性權益優於男性達顯著水準，結果如下表 3。

3. 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因應策略之現況分析

在 229 位填答者的結果中，顯示中位數僅直接攻擊策略高於 M ，大多數的眾數都低於 M ，顯示一半人在策略使用上多為「從未」或「很少（1-3 次）」，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隔絕封鎖策略與直接攻擊策略的 M ，介於「很少（1-3 次）」與「偶爾（4-6 次）」，如下表 4。

表 2

有遭受數位性別親密暴力者總量表與分量表之基本資料分析 (n=229)

因素	敘述統計	性別		學制			目前戀愛狀態		
		男 (58 人)	女 (169 人)	多元 性別 (2 人)	大學 生 (156 人)	碩博 士 (73 人)	固定 一位 (148 人)	一位 以上 (6 人)	沒有 固定， 曾經 交往 過 (75 人)
監視	M	1.53	1.61	1.90	1.58	1.64	1.56	2.08	1.62
控制	S D	0.71	.071	1.27	0.70	0.73	0.67	0.75	0.78
冒用	M	1.17	1.12	1.25	1.13	1.14	1.12	2.02	1.08
恐嚇	SD	0.45	0.33	0.18	0.35	0.38	0.33	0.92	0.25
直接	M	1.22	1.33	1.94	1.30	1.32	1.27	2.19	1.32
攻擊	SD	0.42	0.47	1.34	0.54	0.58	0.51	0.76	0.55
總量	M	1.32	1.36	1.70	1.34	1.38	1.33	2.09	1.35
表	SD	0.46	0.47	0.93	0.45	0.52	0.44	0.73	0.47

表 3

性別平權意識量表結果分析

	性別	人數	M	SD	t	p
性別角色行為規範	生理男	58	4.5	1.01	2.89	<0.001**
	生理女	169	4.90	0.86		
爭取女性權益	生理男	58	3.80	1.13	5.29	<0.001**
	生理女	169	4.62	0.99		
總體性別平權意識	生理男	58	4.14	0.82	3.03	<0.001**
	生理女	169	4.50	0.96		

* $p < .05$, ** $p < .01$

表 4

有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因應策略分量表程度與人數統計 (n=229)

因素	M	SD	中位數	眾數
負向情緒調節策略	2.57	0.95	2.50	2.00
增加安全策略	2.13	0.98	2.00	1.00
隔絕封鎖策略	2.47	1.04	2.33	2.00
直接攻擊策略	2.23	0.72	2.25	2.00
尋求協助策略	1.56	0.74	1.33	1.00
自我傷害策略	1.51	0.83	1.00	1.00

年齡分析顯示，22 歲以上的受測者在增加安全策略方面的 M 為 2.30，SD 為 1.04，而 22 歲以下者的 M 為 1.99，SD 為 0.90。t 檢定結果顯示 $t=2.37$ ， $p=0.01<.05$ ，達到顯著水準，顯示兩者存在差異。性別分析方面，生理女性（169 人）與生理男性（58 人）之間進行獨立樣本 t 檢定，發現在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隔絕封鎖策略與直接攻擊策略上存在差異。例如，在負向情緒調節策略中，女性的 M 為 2.65，SD 為 0.92，而男性的 M 為 2.33，SD 為 0.98， $t=2.23$ ， $p=0.027<.05$ 。其他兩項策略也呈現類似結果（女性在隔絕封鎖策略 M 為 2.59，SD 為 1.09，男性在隔絕封鎖策略 M 為 2.16，SD 為 0.83， $t=3.14$ ， $p=0.00<.05$ 達顯著水準；女性在直接攻擊策略 M 為 2.33，SD 為 0.74，男性在直接攻擊策略 M 為 1.95，SD 為 0.61， $t=3.45$ ， $p=0.00<.05$ 達顯著水準）。戀愛次數分析中，區分為戀愛次數 1 次（52 人）、戀愛次數 2 次（63 人）、戀愛次數 3 次（51 人）以及戀愛次數 4 次以上（63 人），進行多變量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 Wilks' Lambda 的 F 值為 2.634， $P=0.00$ ，達顯著水準。進一步分析比較，得到負向情緒調節策略（ $P=0.00$ ）、隔絕封鎖策略（ $P=0.00$ ）、直接攻擊策略（ $P=0.00$ ）與自我傷害（ $P=0.00$ ）上存在顯著差異，如下表 5。最終結論表明，年齡、性別、戀愛次數以及目前感情狀態均對填答者在負向情緒調節、隔絕封鎖、直接攻擊等安全策略方面產生顯著影響。

（二）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關係

1.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之相關情形

有遭受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檢測，結果顯示如下表 6。監視控制與性別角色行為規範呈現負相關；冒用恐嚇與性別角色行為規範、爭取女性權益、性別意識總體量表負相關；直接攻擊與性別角色行為規範、爭取女性權益、性別意識總體量表負相關。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總量表與性別角色行為規範、爭取女性權益、性別意識總體量表負相關。

表 5

以戀愛次數分析因應策略使用之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自變數	依變數	Type III Sum of Squares	自由度	Mean Square	F	顯著性	Partial Eta Squared
戀愛分組	負向情緒調節	170.49	3	58.83	4.11	0.01**	0.05
	增加安全	77.85	3	25.95	1.72	0.16	0.02
	隔絕封鎖	150.57	3	50.18	5.43	<0.001**	0.07
	直接反抗	114.37	3	38.12	4.78	<0.001**	0.06
	尋求協助	4.39	3	1.46	0.03	0.83	0.00
	自我傷害	46.16	3	15.39	5.89	<0.001**	0.73

* $p < .05$, ** $p < .01$

表 6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相關（ $n=229$ ）

		性別平權意識							
		性別角色 行為規範		性別特質 刻板印象		爭取女性權益		總量表	
		r	p	r	p	r	p	r	p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監視控制	-.16	.02*	-.01	.94	-.10	.14	-.13	.06
	冒用恐嚇	-.42	<0.001**	-.11	.10	-.24	<0.001**	-.34	<0.001**
	直接攻擊	-.27	<0.001**	-.12	.07	-.14	<0.001*	-.21	<0.001**
	總量表	-.29	<0.001**	-.08	.026	-.17	.01*	-.22	<0.001**

* $p < .05$, ** $p < .01$

2.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因應策略之相關達顯著，具有線性關係

皮爾採用森積差相關對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研究對象與因應策略進行檢測，皆達顯著。進一步檢測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分量表、總量表與負向情緒調節、增加安全、隔絕封鎖、直接攻擊、尋求協助、自我傷害之線性關係，如表 7。進一步檢測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總量表與情緒調節、增加安全、

隔絕封鎖、直接反抗、尋求協助、自我傷害之線性關係如表 8，從表 8 可知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能有效運測因應策略，且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 229 人，以直接反抗與自我傷害兩項策略，預測力較高分別為 21%與 24%，情緒調解也有 15%。

3.性別平權意識、因應策略之相關情形

運用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者進行皮爾森積差相關進行檢測，僅爭取女性權益與自我傷害呈現負相關， $r = -.14$ ， $p = .04 < .05$ 。性別意識總體量表與自我傷害呈現負相關， $r = -.13$ ， $p = .01 < .05$ 。

表 7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n=229)

	因應策略											
	情緒調節		增加安全		隔絕封鎖		直接反抗		尋求協助		自我傷害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r 值	P 值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總量表	監視控制	.38	.00**	.20	<0.001**	.27	.00**	.46	<0.001**	.25	.47	<0.001**
	冒用恐嚇	.21	.00**	.22	<0.001**	.19	.00**	.26	<0.001**	.29	.40	<0.001**
	直接攻擊	.35	.00**	.21	<0.001**	.32	.00**	.40	<0.001**	.31	.36	<0.001**
	總量表	.39	.00**	.25	<0.001**	.31	.00**	.46	<0.001**	.32	.49	<0.001**

* $p < .05$, ** $p < .01$

表 8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因應策略之相關線性關係(n=229)

	β	R^2	調整 R^2	F 值	p	t	p
情緒調節	.39	.15	.15	40.04	<0.001**	6.33	<0.001**
增加安全	.25	.06	.06	14.61	<0.001**	3.82	<0.001**
隔絕封鎖	.31	.10	.09	24.77	<0.001**	4.98	<0.001**
直接反抗	.46	.21	.21	61.95	<0.001**	7.87	<0.001**
尋求協助	.32	.10	.10	26.57	<0.001**	5.16	<0.001**
自我傷害	.49	.24	.24	72.06	<0.001**	8.49	<0.001**

** $p < .01$

(三) 調節作用

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者，我們進行了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和性別平權意識之間的交互作用檢測。結果顯示，這兩者在因應策略的負向情緒調節方面存在顯著的交互作用，如下表 9（遭受親密關係暴力者之 $\beta=.00$ ， $R^2=.42$ ，調整後 $R^2=.18$ ， $F=15.99$ $P=.00<.01$ ， $t=2.52$ 、 $P=.01<.05$ ）。性別平權意識被證實為調節變項，當受到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影響時，高性別平權意識者比低性別平權意識者更傾向於運用更多負向情緒調節策略，如圖 2。進一步細分性別，對女性進行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和性別平權意識之間的交互作用檢測，結果表明性別平權意識對負向情緒調節存在著重要的調節作用，特別是當女性的性別平權意識較低時，面對嚴重的數位性別暴力時，她們意識到需要更多的負向情緒調節策略。同時，高性別平權意識女性在這種情境下表現出更強的負向情緒調節行為，超越了低性別平權意識者的水平，如表 8。對於僅對男性進行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和性別平權意識之間的交互作用檢測，研究結果呈現出類似的趨勢。性別平權意識被驗證為尋求協助策略的重要調節變項，特別是當男性的性別平權意識較低時，隨著數位性別暴力的嚴重程度增加，他們才會意識到需要更多的尋求協助。这一结果强调了性別平權意識在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影響下的調節作用，表 9。

表 9

所有填答者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調節效果檢測 (n=229)

	β	R^2	調整 R^2	F	p	t	p	LLCI	ULCI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情緒調節	.00	.42	.18	15.99	.00**	2.52	.01*	.00	.00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增加安全	-.00	.26	.07	5.22	.00**	-.91	.36	-.00	.00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隔絕封鎖	.00	.33	.10	8.68	.00**	.36	.72	-.00	.00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直接反抗	.00	.48	.22	21.68	.00**	1.48	.14	.00	.00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尋求協助	-.00	.37	.14	11.99	.00**	-1.78	.08	-.00	.00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意識-->自我傷害	.00	.49	.24	24.10	.00**	.82	.41	.00	.00

** $p < .01$

圖 2

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之調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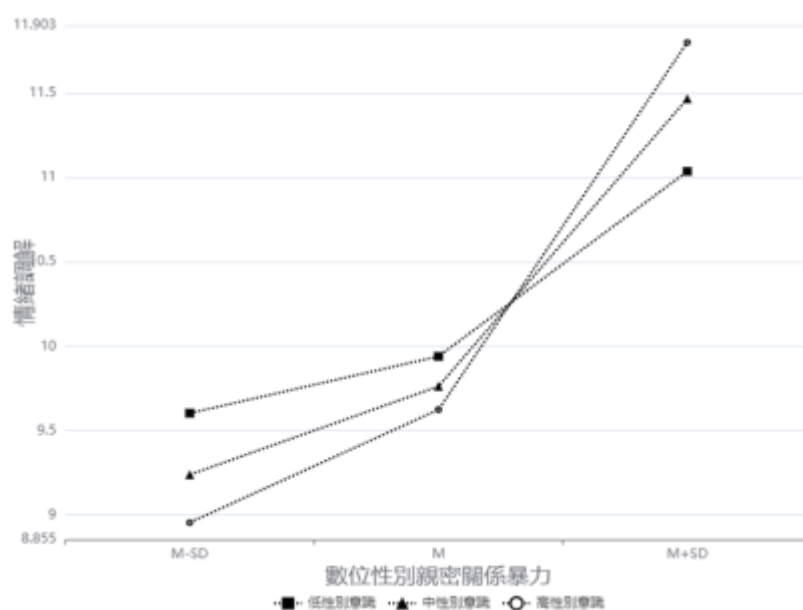


表 10

男、女性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與性別平權意識調節作用

性別		β	R^2	調整 R^2	F	p	t	p	LLCI	ULCI
女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平權意識--	.00	.47	.22	27.08	.00**	3.86	<0.001**	.00	.01
	>負向情緒調節									
男	數位性別暴力*									
	性別平權意識--	-.00	.33	.11	3.78	.01**	-2.02	.05*	-.00	.00
	>尋求協助									

* $p < .05$, ** $p < .01$

(四) 多元迴歸結果

透過多元迴歸分析，我們對性別、年齡、戀愛次數、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以及因應策略進行了綜合的探究，具體結果見於下表 11。整體評估表明，年齡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對負向情緒調節策略具有顯著的預測作用；戀愛次數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對隔絕封鎖策略的預測性明顯；性別、戀愛次數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對直接攻擊策略的預測效果突出，同時戀愛次數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對自我傷害策略的預測亦相當顯著。經調整後，相應的 R^2 值分別為 0.17、0.14、0.30、0.29，清晰呈現出性別、戀愛次數

以及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在直接攻擊策略與自我傷害策略的預測方面具有最佳的解釋力。

表 11

性別、年齡、戀愛次數、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進行多元迴歸

	β	R^2	調整 R^2	F	p	t	p
年齡*	-.10	.17	0.16	16.03	<0.001**	-2.16	.03*
數位性別暴力	.39					7.24	.00**
-->負向情緒調節							
數位性別暴力	.17	.04	.03	3.00	.01*	3.09	.00**
-->增加安全							
戀愛次數*	.14	.14	.13	12.75	<0.001**	2.82	.01**
數位性別暴力	.30					5.83	.00**
-->隔絕封鎖							
性別*	.16	.30	.29	33.10	<0.001**	3.54	.00**
戀愛次數*	.17					3.60	.00**
數位性別暴力	.44					9.63	.00**
-->直接攻擊							
數位性別暴力	.31	.08	.08	7.47	<0.001**	5.98	.00**
-->尋求協助							
戀愛次數*	.14	.29	.28	31.17	<0.001**	3.08	.00**
數位性別暴力	.47					10.22	.00**
-->自我傷害							

* $p < .05$, ** $p < .01$

二、討論

隨著數位網路科技的發展，伴侶之間通過數位網路進行互動的頻率越來越高，因此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發生率也隨之增加。本研究旨在了解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方面的現狀，並探討這些因素之間的關聯性。

本研究自編的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量表主要分為三個向度：監視控制、冒用恐嚇與直接攻擊。過去文獻中，Spitzberg 與 Hoobler (2002) 主要關注於跟蹤與過度追求，量表包括過度親密 (hyperintimacy)、現實生活移情 (RL-transference) 與威脅 (threat)。Borrajó 等人 (2015b) 則區分為監視控制 (Control/Monitoring) 與直接攻擊 (Direct Aggression)，本研究與過去研究之差異主要在「冒用恐嚇」。實際上，冒用恐嚇更適合包含侵入伴侶電子設備、未經同意發送私密照片和威脅家人朋友等行為 (Bélanger et al., 2021; 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 Lyndon et al., 2011; Lara, 202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 Woodlock, 2016)。因此，本研究的量表測量了監視控制和直接攻擊，並新增了冒用恐嚇，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

調查結果顯示，395 名研究參與者中有 229 人 (58%) 曾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三個分量表中，監視控制的平均值最高 ($M = 1.53$)。此結果與國外研究相似，但比例略低，顯示監視控制的頻率最高，而攻擊行為較低 (Borrajó et al., 2015a, 2015b; Caridade et al., 2019; 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Leisring & Giumetti, 2014; Marganski & Melander, 2018)，對照陳怡青 (2024) 研究結果顯示最常見的數位親密關係暴力型態為跟蹤肉搜 (11.1%)，其次是控制 (7.2%) 之結果相似，因為跟蹤肉搜與控制，都屬於本研究定義「監視控制」之概念。本研究結果顯示，冒用恐嚇的頻率相對較低。根據國外研究，未經同意分享私密影音圖像的盛行率為 8.8% (Patel & Roesch, 2022)，而國內影像暴力的盛行率為 1.8% (王珮玲等人, 2023)，兩者盛行率均不到 10%。然而，這一數據可能因為受害者不知照片已被散佈而被低估。過去的研究指出，有些受害者是通過 Google 搜尋自己的名字或收到自己的裸照郵件才得知遭受了侵害 (Fernet et al., 2019)。由此可見，冒用受害者名義散佈照片的情況，受害者本人可能並不知曉。

目前，數位親密關係暴力仍被視為心理暴力，類似於現實生活中的口頭暴力，被認為是親密關係中的精神暴力。與過去研究一致，六成的學生表示在過去一年中對伴侶施加過精神暴力 (沈瓊桃, 2013)。國外研究顯示，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受害者隨著交往時間的增加，可能會出現日常生活中的親密關係暴力行為 (Hellevik, 2019; Hinduja & Patchin, 2021; Lu et al., 2021; Marganski & Melander, 2018)。本研究也發現，隨著戀愛次數的增加，負向情緒調節策略、隔絕封鎖策略、直接攻擊策略與自我傷害上存在顯著差異。

更進一步地，青少年不總是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視為暴力行為，經常誤認為是親密伴侶表現愛和關心的方式，或未意識到其嚴重性 (Harris &

Woodlock, 2019; Lu et al., 2021)。未來研究需進一步探討國內青少年是否也低估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嚴重性。

在因應行為策略方面，本研究探討了負向情緒調節、增加安全、隔絕封鎖、直接攻擊、尋求協助與自我傷害。結果顯示，負向情緒調節、直接攻擊、尋求協助和自我傷害的因應策略與過去研究相似（沈瓊桃，2013；Carver, 1997; Cupach & Spitzberg, 2000; Nicastro et al., 2000; Spitzberg & Hoobler, 2002; Spitzberg et al., 2004）。增加安全主要集中在資訊安全方面，而隔絕封鎖是常見的因應行為（Harris & Woodlock, 2019; Woodlock, 2016; Weathers et al., 2019），這顯示量表具有良好的內容效度與建構效度。

本研究結果發現，數位親密關係暴力與因應行為之間存在線性關係。不論是總量表還是分量表，遭受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越嚴重，受害者越容易自我傷害，負向情緒調節行為越高，且會採取直接攻擊來抵禦。這與過去研究一致，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受害者的適應不良行為比例高於非受害者，通常表現為憂鬱情緒（Lara, 2020; Melander & Marganski, 2020; Patel et al., 2022）。本研究發現女性常使用負向情緒調節策略，與過去研究一致，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女性痛苦指數高於男性（Henry et al., 2020; Lara, 2020; Patel et al., 2022）。

冒用恐嚇與自我傷害之間有高度解釋力，這點與過去研究一致，受害者察覺到自己被冒用恐嚇時，通常遭受嚴重的傷害和痛苦，例如裸照被散佈或家人朋友知曉，這是一種難以防範的直接傷害（Fernet et al., 2019）。受害者也會採取直接攻擊來抵禦，例如：尋求司法協助作為一種攻擊型的自我保護（Spitzberg & Hoobler, 2002）。網路空間的隔絕可能使受害者更能採取直接攻擊策略。因此，本研究認為數位親密關係暴力會導致大專院校青年採取不適當的因應策略，甚至引發憂鬱、痛苦和自我傷害行為，需加強大專院校學生的情感教育，提升他們辨識數位網路親密關係暴力行為的能力，並提供有效的因應策略。

研究發現性別平權意識具有負向情緒調節作用，結果如下：（一）負向情緒調節的調節效果顯著：性別平權意識較低的女性，僅在遭遇較嚴重的數位性別暴力時，才明顯感受到受害並產生較高的負向情緒反應；反之，平權意識較高者能較早辨識不當行為並調節情緒，降低失控反應風險。（二）與既有研究一致：過去文獻指出女性主義觀點對網路性騷擾具有保護性調節功能（Shi & Zheng, 2021）。本研究亦發現性別平權意識與自我傷害及負向情緒調節呈負相關，顯示提升平權意識有助於減少不適應的因應策略。（三）男性部分也具有調節作用：男性的性別平權意識會影響其是否採取尋求協助策略，顯示網路空間中的性別權力不平等仍影響男性的求助意願。

研究發現，性別、戀愛次數和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在直接攻擊策略和自我傷害策略的預測方面具有最佳解釋力，這與過去研究一致，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中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可能是相互的（Caridade et al., 2019; Lu et al., 2021）。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通常以「監視控制」為常見的表現形式。在某些情況下，當雙方感情相處融洽時，「監視控制」行為可能被錯誤地解讀為關

心或愛的表達。然而，這種詮釋存在風險，因為它掩蓋了行為本質中的控制與侵犯性，可能導致受害者忽視其危害性，甚至接受或正當化這種行為。值得注意的是，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不僅局限於線上空間，其形式與特徵往往與離線約會暴力密切相關，兩者之間呈現高度相關性（Borrajó et al., 2015b; Hellevik, 2019; Henry et al., 2020）。因此，需強調區分關愛與控制行為，並透過教育與意識提升，幫助人們辨識並抵制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的隱蔽性影響。實體約會暴力中口頭暴力居多，顯示約會暴力是雙向的（沈瓊桃，2013；李珊等人，2017；修慧蘭、孫頌賢，2003），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與未來生活中的親密關係暴力可能密切相關。家暴和跟蹤騷擾混合實體與通訊的暴力行為，未來需要進一步研究。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本研究以自編量表探討大專院校學生的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性別平權意識與因應策略之關聯。量表展現良好信效度，能有效測量相關構念。在 395 份有效樣本中，229 人（58%）曾遭遇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以監視與控制行為最為常見，顯示數位科技已成為親密關係中權力運作與情感操控的重要途徑。

研究結果指出，暴力經驗與因應策略呈線性關係；受害程度越高，越可能採取直接攻擊、自我傷害等高風險行為，反映受害者在壓力與情緒失衡下可能陷入不適應的回應模式。性別平權意識則具有負向調節效果，平權意識越高者越傾向採取較具適應性的策略，並降低敵意反應或自我傷害行為，顯示其在預防與緩衝負面影響上具保護性。

預測分析顯示，性別、戀愛次數與遭受暴力程度對高風險因應策略具有最佳解釋力。女性受害者更可能採取情緒化或內化的反應，符合既有文獻中女性在親密暴力脈絡中承受較高情緒負荷的趨勢。

整體而言，本研究揭示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互動中的脆弱性，並強調性別平權意識在理解與回應數位性別親密關係暴力中的關鍵作用，對教育介入與未來研究均具有重要意涵。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網路問卷蒐集資料，具便利性但存在若干限制。首先，樣本性別比例明顯失衡，男性受試者不足，影響性別比較的精確度與外部效度，可能與女性對親密暴力議題的較高敏感度與回應意願相關。未來宜採多元招募策略以提升性別均衡性。

其次，雖以大專院校學生為研究母群體，但樣本年齡跨度大（18 至 57 歲），不同教育階段與生命發展任務可能影響其科技使用習慣與情感互動模式，增加行為差異來源。此外，招募文宣未明確說明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範疇，可能導致部分受試者因概念理解不足而未進入填答，影響樣本代表性。

本研究量表為研究者自編工具，雖經預試修訂並具初步信效度，但仍可能受限於概念界定及操作化不足。鑑於相關領域缺乏標準化量尺，未來需在更大且異質性更高的樣本中進行驗證，以提升跨群體適用性與測量穩定度。

最後，研究對象限於大專院校學生，無法推論至其他年齡層與多元族群。尤其性少數在既有研究中呈現較高受害風險，但本研究樣本有限，無法進行群體比較。建議後續研究擴大族群與樣本來源，以增進研究結果的普遍性與推論效度。

三、建議

（一）實務工作建議

- 1.本研究顯示性別平權意識具保護效果，高等教育機構應強化性別平權、情感教育與科技倫理課程。
 - 2.學生需被培力辨識不當監控、威脅與暴力行為，並選擇更具適應性的因應策略。
- 校內諮商中心、性平會及社工體系應建立跨專業合作機制，提高受害學生求助可近性。
- 3.政府統計資料庫應納入親密關係暴力（含數位形式）項目，作為政策與教育的重要依據。

（二）未來研究方向

- 1.建議擴大樣本至不同年齡層與社會角色，如社會新鮮人與職場族群，以掌握跨年齡的科技互動差異。
- 2.應針對性少數群體進行更深入分析，探討其受暴風險與因應策略。
- 3.方法上可加入質性研究，補足量化侷限，深入理解受害者主觀經驗、關係脈絡與暴力形成歷程。

（三）政府政策建議

- 1.政府在制定數位治理政策時需納入性別觀點，包括社群平台管理、個資保護與監控行為界定。
- 2.應檢視相關法規與刑罰，以提升數位親密暴力的治理效能。
- 3.教育部應強化大專院校性別平權與情感教育的課程要求，並督導學校提供數位親密暴力因應指引，提升學生安全意識與應對能力。

參考文獻

中文文獻

- 維基百科（2023 年 12 月 10 日）：**#MeToo**。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F%BC%83MeToo>
- 內政部統計處（2023）：**內政統計通報 112 年第 28 週**。 <https://ws.moi.gov.tw/>
- 王大維、余柏龍（2014 年 11 月）：**成人性別平等意識量表編製與調查—以屏東縣為例**〔口頭發表〕。2014 年回顧與前瞻—性別平等教育法立法十週年學術研討會，高雄市，臺灣。
- 王珮玲、陳怡青、方念萱（2023）：**數位性別暴力盛行率研究初探**。**臺大社會工作學刊**，（47），149-199。
[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2306_\(47\).0004](https://doi.org/10.6171/ntuswr.202306_(47).0004)
-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2021）：**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定義、類型及其內涵說明**。
<https://gec.ey.gov.tw>
- 李昕（2020）：**曾遭遇性侵害的成年女性透過社群平台公開發聲之經驗探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 李珊、林丞增、林家興、許玉霜（2017）：**男性還是女性更具攻擊性？大學生約會暴力相關因素之探究**，**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學報**，31，103-130。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1711_\(31\).0004](https://doi.org/10.6308/JCPRC.201711_(31).0004)
- 沈瓊桃（2013）：**大專青年的約會暴力經驗與因應策略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6（1），1-31。
[https://doi.org/10.6308/JCPRC.201711_\(31\).0004](https://doi.org/10.6308/JCPRC.201711_(31).0004)
- 沈瓊桃、趙雨龍、高建秀、黃頌恩、張晟、華珮君（2009）：**兩岸三地青少年親密關係暴力現況之探討**。載於社團法人臺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主編），**家庭暴力與性侵害防治實務工作研討會**（頁 266-281）。社團法人臺灣家庭暴力暨性犯罪處遇協會。
<https://doi.org/10.6632/TATDVSO.2009.14>
- 邱育佳、林燕卿（2020）：**網路性犯罪：復仇色情發生率及其相關因素之文獻探討**。**臺灣性學學刊**，26（1），95-114。
<https://doi.org/10.3966/160857872020052601004>
- 修慧蘭、孫頌賢（2003）：**大學生約會暴力行為之測量與調查**。**教育與心理研究**，6（3），471-499。
- 翁楊絲茜、葉怡宣、陳姿佑、洪婉甄、陳映瑄、王翌任（2013）：**大專生性別平等意識與父母教養之相關研究—以臺灣科技大學為例**。**性學研究**，4（1），71-91。
<https://doi.org/10.6206/SIS.2013.0401.04>
- 張凱強（2016）：**論復仇式色情這當代厭女文化下的網路獵巫行動**。**婦研縱橫**，（105），16-21。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6.105.16>
- 張惠華（2015）：**大學生遭受網路性騷擾經驗及因應方式調查之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樹德科技大學。
- 教育部統計處（2022a）：**數位網路性別暴力統計**。<https://depart.moe.edu.tw/>

- 教育部統計處（2022b）：學校通報親密關係暴力事件統計。
<https://depart.moe.edu.tw/>
- 畢恆達（2003）：男性性別平權意識之形成。《應用心理研究》，（17），51-84。
- 陳又敬、鄧煌發、董道興（2019）：親密關係暴力之理論探討。《臺灣性學學刊》，25（1），61-100。<https://doi.org/10.3966/160857872019052501003>
- 陳怡青（2024）：誰是受害人？台灣數位親密關係暴力的群體特性與暴力特性。《台灣衛誌》，43（1），69-81。
[https://doi.org/10.6288/TJPH.202402_43\(1\).112119](https://doi.org/10.6288/TJPH.202402_43(1).112119)
- 陳莉蓁（2016）：性剝削、娼妓制度與復仇式色情：Janine Benedet 教授與婦援會交流紀實。《婦研縱橫》，（105），84-89。
<https://doi.org/10.6256/FWGS.2016.105.84>
- 陸偉明（2011）：性別教育與生活。雙葉。
- 游美惠（2012）：厭女（Misogyny）。《性別平等教育季刊》，（58），108-111。
<https://doi.org/10.6486/GEEQ.201206.0108>
- 黃楷婷、趙善如（2015）：婦女的親密關係暴力迷思與父權主義之關係-以屏東縣為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9（4），1-32。
[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5.9\(4\)1](https://doi.org/10.6284/NPUSTHSSR.2015.9(4)1)
- 楊幸真（2019）：性別主流化與人才培力：醫學大學職員性別平權意識培力課程之經驗探析。《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7（1），181-230。
- 廖美蓮（2019）：走進層層密室－親密關係性暴力的定義態樣、盛行率與工作挑戰之文獻回顧。《東吳社會工作學報》，（37），81-118。
-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23）：同性親密關係暴力通報案件統計(含通報人員別、暴力類型及兩造關係)。<https://dep.mohw.gov.tw/>
- 衛生福利部保護司（2023）：家庭暴力通報事件被害人案件類型及性別統計。
<https://dep.mohw.gov.tw/>
- 鄧璟筠（2020）：臺灣人的性別平權意識形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慈濟大學。
- 羅燦煥（2002）：他的性騷擾?她的性騷擾?: 性騷擾的性別化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46），193-249。
<https://doi.org/10.29816/TARQSS.200206.0006>
- 羅燦煥（2003）：線上性別 vs.線下性別：網路互動中的性別形構。《新聞學研究》，76，43-90。[https://doi.org/10.30386/MCR.200307_\(76\).0003](https://doi.org/10.30386/MCR.200307_(76).0003)
- 羅燦煥（2012）：性騷擾過後：女性性騷擾因應處理之衍生性衝擊。《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3），155-191。<https://doi.org/10.7082/CJGC.201208.0155>

英文文獻

-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use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in experimental design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26, 271-284. [https://doi.org/10.1016/0167-8116\(91\)90020-8](https://doi.org/10.1016/0167-8116(91)90020-8)
- Bargad, A., & Hyde, J. S. (1991). Women's studies: A study of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women.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5(2), 181-201.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1991.tb00791.x>
- Becker, A., Ford, J. V., & Valshtein, T. J. (2021). Confusing stalking for romance: Examining the labeling and acceptability of men's (cyber)stalking of women. *Sex Roles*, 85(1-2), 73-87.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20-01205-2>
- Bélanger, J. J., Collier, K. E., Nisa, C. F., & Schumpe, B. M. (2021). Crimes of passion: When romantic obsession leads to abusiv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89(6), 1159-1175. <https://doi.org/10.1111/jopy.12642>
- Borrajo, E., Gámez-Guadix, M., & Calvete, E. (2015). Cyber dating abuse: prevalence,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offline dating aggress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6(2), 565-585. <https://doi.org/10.2466/21.16.PR0.116k22w4>
- Borrajo, E., Gámez-Guadix, M., Pereda, N., & Calvete, E. (2015).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yber dating abuse questionnaire among young couple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48, 358-36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5.01.063>
- Brown, C., Flood, M., & Hegarty, K. (2020). Digital dating abuse perpetration and impact: The importance of gender.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080/13676261.2020.1858041>
- Caridade, S., Braga, T., & Borrajo, E. (2019). Cyber dating abuse (CDA): Evidence from a systematic review.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48, 152-168. <https://doi.org/10.1016/j.avb.2019.08.018>
- Carver C. S. (1997). You want to measure coping but your protocol's too long: consider the brief COP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4(1), 92-100. https://doi.org/10.1207/s15327558ijbm0401_6
- Citarella, A. I., & Mueller, J. A. (2015).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feminist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psychological maltreatment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Student Affairs Research and Practice*, 52(3), 327-340. <https://doi.org/10.1080/19496591.2015.1061835>
- Clayton, R. B., Nagurney, A., & Smith, J. R. (2013). Cheating, breakup, and divorce: Is Facebook use to blame?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6(10), 717-720.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2.0424>
- Cupach, W. R., & Spitzberg, B. H. (2000). Obsessive relational intrusion: incidence, perceived severity, and coping. *Violence and Victims*, 15(4), 357-372. <https://doi.org/10.1891/0886-6708.15.4.357>
- Damra, J. K., Abujilban, S., & Akour, M. M. (2024). The cyber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revalence,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with in-person intimate violence victimization.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45(7), 1683-1705. <https://doi.org/10.1177/0192513x231181366>

- Ebo, B. (1998). *Cyberghetto or Cybertopia? Race, Class, and Gender on the Internet*.
<http://publisher.abc-clio.com/9780313025082>
- Faith, B. (2022). Tackling online gender-based violence; understanding gender, development, and the power relations of digital spaces.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26(3), 325-340. <https://doi.org/10.1080/09718524.2022.2124600>
- Fassinger, R. E. (1994).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of the Attitudes Toward Feminism and the Women's Movement (FWM) scale.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8(3), 389-402. <https://doi.org/10.1111/j.1471-6402.1994.tb00462.x>
- Fatimatuzzahro, F., & Achmad, Z. A. (2022). What If It Was You (#WIIWY) digital activism on TikTok to fight gender-based violence online and cyberbullying. *Masyarakat Kebudayaan Dan Politik*, 35(4), 450-465. <https://doi.org/10.20473/mkp.V35I42022.450-465>
- Fernet, M., Lapierre, A., Hébert, M., & Cousineau, M.-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cyber intimate partner victimization in adolescent girls and women.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100, 11-25.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9.06.005>
- Freed, D., Palmer, J., Minchala, D., Levy, K., Ristenpart, T. & Dell, N. (2017).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 qualitative analysis with multiple stakeholders. *P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46(1), 1-22. <https://doi.org/10.1145/3134681>
- Freed, D., Havron, S., Tseng, E., Gallardo, A., Chatterjee, R., Ristenpart, T., & Dell, N. (2019). "Is my phone hacked?" Analyzing Clinical Computer Security Interventions with Survivors of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Proceedings of the ACM 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3(CSCW), 1-24. <https://doi.org/10.1145/3359304>
- Gerson, J. M., & Peiss, K. (1985). Boundaries, negotiation, consciousnes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2(4), 317-331. <https://doi.org/10.1525/sp.1985.32.4.03a00020>
- Hall, M., Hearn, J., & Lewis, R. (2022). *Digital gender-sexual violations: Violence, technologies, motivations*.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003138273-4>
- Harris, B., & Vitis, L. (2020). Digital intrusions: Technology, spatiality a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Journal of Gender-Based Violence*, 4(3), 325-341. <https://doi.org/10.1332/239868020X15986402363663>
- Hellevik, P. M. (2019). Teenagers' personal accounts of experiences with digital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and abus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92, 178-187. <https://doi.org/10.1016/j.chb.2018.11.019>
- Henry, N., & Powell, A. (2015). Embodied harms: gender, shame, and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Gender, shame, and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1(6), 758-779.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5576581>
- Henry, N., & Powell, A. (2018).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A literature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Trauma, Violence & Abuse*, 19(2), 195-208.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16650189>

- Henry, N., Flynn, A., & Powell, A. (2020). Technology-facilitated domestic and sexual violence: A review.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6(15-16), 1828-1854.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9875821>
- Hinduja, S., & Patchin, J. W. (2021). Digital dating abuse among a national sample of U.S. youth.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6(23-24), 11088-1110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9897344>
- Jöreskog, K.G.(1970). 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simplex models.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23, 121-145. <https://doi.org/10.1111/j.2044-8317.1970.tb00439.x>
- Kaur, P., Dhir, A., Tandon, A., Alzeiby, E. A., & Abohassan, A. A. (2021).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n cyberstalking. An analysis of past achievements and future promises.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63(120426), 120426. <https://doi.org/10.1016/j.techfore.2020.120426>
- Lara, L. (2020). Cyber dating abuse: Assessment, prevalence, and relationship with offline violence in young Chilean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7(5), 1681-1699.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0907159>
- Lazarus, R. S., & Folkman, S. (1984).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 Lee, S. Y., Kim, I. S., & Ko, J. H. (2019). *Development of a Revised Korean Gender Egalitarian Scale*. Korean Women's Development Institute. <https://eng.kwdi.re.kr/>
- Leisring, P. A., & Giumetti, G. W. (2014). Sticks and stones may break my bones, but abusive text messages also hurt: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yber Psychological Abuse scale. *Partner Abuse*, 5(3), 323-341. <https://doi.org/10.1891/1946-6560.5.3.323>
- Lu, Y., Van Ouytsel, J., & Temple, J. R. (2021). In-person and cyber dating abuse: 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38(12), 3713-3731. <https://doi.org/10.1177/02654075211065202>
- Lyndon, A, Bonds-Raacke, J, & Cratty A. D. (2011). College students' Facebook stalking of ex-partners.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14(12), 711-16. <https://doi.org/10.1089/cyber.2010.0588>
- Maddocks, S. (2018). From Non-consensual Pornography to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Charting the Course of a Problem with Many Names. *Australian Feminist Studies*, 33(97), 345-361. <https://doi.org/10.1080/08164649.2018.1542592>
- Marganski, A., & Melander, L. (2018).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in the cyber and real world: Examining the extent of cyber aggression experience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in-person dating violence.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3(7), 1071-1095. <https://doi.org/10.1080/08164649.2018.1542592>
- Melander, L. A. (2010). College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intimate partner cyber harassment.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and Social Networking*, 13(3), 263-268. <https://doi.org/10.1177/0886260515614283>

- Melander, L. A., & Marganski, A. J. (2020). Cyber and in-person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victimization: Examining maladaptive psychosoci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Cyberpsychology*, 14(1). <https://doi.org/10.5817/CP2020-1-1>
- Nicastro, A. M., Cousins, A. V., & Spitzberg, B. H. (2000). The tactical face of stalking. *Journal of Criminal Justice*, 28(1), 69-82. [https://doi.org/10.1016/S0047-2352\(99\)00038-0](https://doi.org/10.1016/S0047-2352(99)00038-0)
- Patel, U., & Roesch, R. (2022). The prevalence of technology-facilitated sexual violence: A meta-analysis and systematic review. *Trauma, Violence & Abuse*, 23(2), 428–443. <https://doi.org/10.1177/1524838020958057>
- Pedersen, W., Bakken, A., Stefansen, K., & von Soest, T. (2023). Sexual victimiz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of physical and image-based sexual abuse among adolescent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52(1), 399–410.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1-02200-8>
- Plan International (2020). *Free to be Online? A report on girls' and young women's experiences of online harassment*. <https://plan-international.org/publications/freetobeonline>
- Seemanthini, T. S. (2015). Socio Cultural Attitude towards Appearance and Multi-dimensional Gender Consciousness in Men and Women -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10(2), 239-248.
- Shi, X., & Zheng, Y. (2021). Feminist active commitment and sexual harassment perception among Chinese women: The moderating roles of targets' gender stereotypicality and type of harassment. *Sex Roles*, 84(7-8), 477-490. <https://doi.org/10.1007/s11199-020-01180-8>
- Spitzberg, B. H., & Hoobler, G. (2002). Cyberstalking and the technologies of interpersonal terrorism. *New Media & Society*, 4(1), 71-9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0222226271>
- Spitzberg, B.H., Cupach, W.R., & Spitzberg, B.H. (2004). *The Dark Side of Relationship Pursuit: From Attraction to Obsession and Stalking* (1st ed.).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09908>
- Thulin, E. J., Zimmerman, M. A., Kusunoki, Y., Kernsmith, P., Smith-Darden, J., & Heinze, J. E. (2022). Electronic teen dating violence curves by age. *Journal of Youth and Adolescence*, 51(1), 45-61. <https://doi.org/10.1007/s10964-021-01517-w>
- Ullman, J. B. (200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B. G. Tabachnick and L. S. Fidell (2001),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4th ed.): 653-771.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 Wajcman, J.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Weathers, M. R., Canzona, M. R., & Fisher, C. L. (2019). Digital media as a context for dating abuse: Connecting adaptive and mal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 to young adult women's well-being. *Affilia*, 34(3), 325–345. <https://doi.org/10.1177/0886109919832005>

- Wick, S. E., Nguyen, A. P., West, J. T., Nagoshi, C. T., Jordan, C., & Lehmann, P. (2020). Cyber Harassment,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Maladjustment in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54(1), 77-87.
- Wilcox, C.(1997).Racial and gender consciousness among African-American women: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Women and Politics*.17(1),73-94.
<https://doi.org/10.1080/1554477X.1997.9970778>
- Woodlock, D. (2016). The abuse of technology in domestic violence and stalk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23(5), 584-602.
<https://doi.org/10.1177/1077801216646277>

Relationships of Cyber dating abuse, Gender egalitarian and Coping Strategi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Jing-Wei Liu、Yi-Ling Yeh

ABSTRACT

The ubiquity of the internet in daily life brings both convenience and significant risks, with cyber gender-based violence emerging as a particularly alarming threat. In campus environments, relationship disputes frequently escalate into various gender equity incidents, manifested through online harassment or the non-consensual sharing of intimate images. Nevertheless, the issue of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are significant absences in research in Taiwan. Therefor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related coping strategy in college students in Taiwan. In this study, we employed three instruments included the *Inventory of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the *Inventory of gender consciousness*, and the *Inventory of coping strategy of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In addition, 229 participants were collected to conduct descriptive analysis, one-way MANOVA,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58% college students have had experience of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especially on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the partner's online activity. The common coping strategies on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include self-harm, negative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irect attack. The emotion regulation conduces to improve coping strategy on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Furthermore, gender,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in love, and the suffering on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can significantly predict the coping strategy of direct attack and self-harm. Finally, suggestions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 cyber gender-sexual intimate relationship violence, gender-consciousness, coping strategy, college students